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

清代版本学史

A History of Edition Studies in the Qing Dynasty

江 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代版本学史

A History of Edition Studies in the Qing Dynasty

江 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版本学史/江曦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161 - 2955 - 5

I. ①清… II. ①江… III. ①版本学—历史—中国—清代
IV. ①G256.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361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吴丽平
责任编辑 吴丽平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3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23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及编辑部成员名单

(一) 编委会

主任：李扬 王晓初

副主任：晋保平 张冠梓 孙建立 夏文峰

秘书长：朝克 吴剑英 邱春雷 胡滨（执行）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宪群	王巍	王利明	王灵桂	王国刚	王建朗	厉声
朱光磊	刘伟	杨光	杨忠	李平	李林	李周
李薇	李汉林	李向阳	李培林	吴玉章	吴振武	吴恩远
张世贤	张宇燕	张伯里	张昌东	张顺洪	陆建德	陈众议
陈泽宪	陈春声	卓新平	罗卫东	金碚	周弘	周五一
郑秉文	房宁	赵天晓	赵剑英	高培勇	黄平	曹卫东
朝戈金	程恩富	谢地坤	谢红星	谢寿光	谢维和	蔡昉
蔡文兰	裴长洪	潘家华				

(二) 编辑部

主任：张国春 刘连军 薛增朝 李晓琳

副主任：宋娜 卢小生 高传杰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宇	吕志成	刘丹华	孙大伟	陈颖	金焯	曹靖
薛万里						

序 一

博士后制度是 19 世纪下半叶首先在若干发达国家逐渐形成的一种培养高级优秀专业人才的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积极倡导，在邓小平同志大力支持下，中国开始酝酿实施博士后制度。1985 年，首批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

中国的博士后制度最初仅覆盖了自然科学诸领域。经过若干年实践，为了适应国家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需要，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决定，将设站领域拓展至社会科学。1992 年，首批社会科学博士后人员进站，至今已整整 20 年。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突飞猛进之时。理论突破和实践跨越的双重需求，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毋庸讳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科学在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乃至研究手段上均存在较大的差距。正是这种差距，激励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正视国外，大量引进，兼收并蓄，同时，不忘植根本土，深究国情，开拓创新，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科学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在短短 20 余年内，随着学术交流渠道的拓宽、交流方式的创新和交流频率的提高，中国的社会科学不仅基本完成了理论上从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而且在中国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伟大创造。中国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制度功不可没。

值此中国实施社会科学博士后制度创设 20 周年之际，为了充分展示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的研究成果，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制度进一步发展，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反复磋商，并征求了多家设站单位的意见，决定推出《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以下简称《文库》）。作为一个集中、系统、全面展示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优秀成果的学术平台，《文库》将成为展示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学术风采、扩大博士后群体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园地，成为调动广大博士后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加速器，成为培养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领军人才的孵化器。

创新、影响和规范，是《文库》的基本追求。

我们提倡创新，首先就是要求，入选的著作应能提供经过严密论证的新结论，或者提供有助于对所述论题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新材料、新方法和新思路。与当前社会上一些机构对学术成果的要求不同，我们不提倡在一部著作中提出多少观点，一般地，我们甚至也不追求观点之“新”。我们需要的是有翔实的资料支撑，经过科学论证，而且能够被证实或证伪的论点。对于那些缺少严格的前提设定，没有充分的资料支撑，缺乏合乎逻辑的推理过程，仅仅凭借少数来路模糊的资料和数据，便一下子导出几个很“强”的结论的论著，我们概不收录。因为，在我们看来，提出一种观点和论证一种观点相比较，后者可能更为重要：观点未经论证，至多只是天才的猜测；经过论证的观点，才能成为科学。

我们提倡创新，还表现在研究方法之新上。这里所说的方法，显然不是指那种在时下的课题论证书中常见的老调重弹，诸如“历史与逻辑并重”、“演绎与归纳统一”之类；也不是我们在很多论文中见到的那种敷衍塞责的表述，诸如“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统一”等等。我们所说的方法，就理论研究而论，指的是在

某一研究领域中确定或建立基本事实以及这些事实之间关系的假设、模型、推论及其检验；就应用研究而言，则指的是根据某一理论假设，为了完成一个既定目标，所使用的具体模型、技术、工具或程序。众所周知，在方法上求新如同在理论上创新一样，殊非易事。因此，我们亦不强求提出全新的理论方法，我们的最低要求，是要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来展开研究并构造论著。

我们支持那些有影响力的著述入选。这里说的影响力，既包括学术影响力，也包括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就学术影响力而言，入选的成果应达到公认的学科高水平，要在本学科领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还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若干年后仍然能够为学者引用或参考。就社会影响力而言，入选的成果应向正在进行着的社会经济进程转化。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有一个转化问题。其研究成果要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向现实政策转化，要向和谐社会建设转化，要向文化产业转化，要向人才培养转化。就国际影响力而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想发挥巨大影响，就要瞄准国际一流水平，站在学术高峰，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我们尊奉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学风。我们强调恪守学术规范，尊重知识产权，坚决抵制各种学术不端之风，自觉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当此学术界世风日下之时，我们希望本《文库》能通过自己良好的学术形象，为整肃不良学风贡献力量。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2年9月

序 二

在 21 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人才已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从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

培养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科研能力和研究成果作为国家的“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胡锦涛同志强调，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新的更大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国家与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切实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展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本土情怀与世界眼光，力争在当代世界思想与学术的舞台上赢得应有的尊严与地位。

在培养和造就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战略与实践上，博士后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博士后制度是在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的建议下，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经国务院批准于 1985 年开始实施的。这也是我国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高层次青年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二十多年来，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我国已建立了科学、完备的博士后制度体系，同时，形成了培养和使用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政府调控和社会参与相结合，服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鲜明特色。通过实施博士后制度，我国培养了一支优秀的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他们在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依托自身优势和兴趣，自主从事开拓性、创新性研究工作，从而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突出的研究能力和强烈的探索精神。其中，一些出站博士后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在“长江学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等国家重大科研人才梯队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可以说，博士后制度已成为国家培养哲学社会科学拔尖人才的重要途径，而且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造就了一支新的生力军。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部分博士后的优秀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现实意义，但往往因为一些客观因素，这些成果不能尽快问世，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现实作用，着实令人痛惜。

可喜的是，今天我们在支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研究成果出版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设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择优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的科研成果，并为其提供出版资助。这一举措不仅在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上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而且有益于提升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的学术地位，扩大其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更有益于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今天，借《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出版之际，我衷心地希望更多的人、更多的部门与机构能够了解和关心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及其研究成果，积极支持博士后工作。可以预见，我国的博士后事业也将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让我们携起手来，共

同努力，推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王岐山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2年9月

摘 要

清代考据学、藏书、刻书的兴盛，为版本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基础，使之成为与目录学、校勘学并立的一门独立的学问。清代出现了大量的版本学家，根据版本学研究的学术倾向，大致可以把他们分为校讎和赏鉴两派。清人通过编写版本目录和善本书志，撰写题跋、札记，摹刻书影等形式记录版本学研究成果。清人以校勘是否精审作为判断版本优劣的第一标准，同时看重版本的文物价值，正是这种善本观，使他们推崇但能辨正地对待宋元旧刻。随着时代的推移，文物价值逐渐超过校勘价值，在善本标准中的比重明显增大。清人已经掌握了较为完备的版本学方法，其中校勘为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他们善于运用版本外在特征、内在证据以及寻求旁证等进行版本鉴定、辨别书贾的版本作伪。

清代版本学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清初到乾隆前期为第一个时期，出现了以钱谦益、毛扆、钱曾为代表的常熟版本学家团体，以及以徐乾学为中心的版本学家团体。钱谦益开清代讲求版本之风，对后世版本学影响较大。冯舒、冯班、陆貽典、何焯等皆以版本事校勘，属校讎派；钱曾、孙从添等注重版本的品评，属赏鉴派。此时出现了一些版本目录，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是其中杰出代表。钱曾《读书敏求记》是第一部注重版本鉴赏的解题目录，孙从添《藏书记要》是第一部系统介绍版本学问题的著作。

从乾隆中期到道光为第二个时期。在考据学发达的背景下，此时版本学大兴，不论是校讎派还是赏鉴派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出现了大量的版本学家，创造了很多版本学著作形式，其中不少

是版本学史上的首创。《天禄琳琅书目》注重对版本的著录和鉴赏，版本鉴定方法完备，其对后世版本目录的编纂乃至整个版本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出现了黄丕烈和顾广圻两位在版本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版本学家。黄丕烈对版本“佞宋”而“求真”，版本鉴定功力精湛，是乾嘉学者中把版本研究推上专学的一位顶尖人物，是赏鉴派版本学家中的巨擘。顾广圻重视宋元旧本，直接导致了其“以不校校之”的校勘学思想，为校讎派版本学家中的杰出代表。《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和《爱日精庐藏书志》皆注重版本著录与考订，对后世善本书志的编写具有典范意义。其他如阮元、孙星衍、钱大昕、瞿中溶、卢文弨、鲍廷博、陈鳧、钱泰吉等都在版本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成绩。

咸、同、光、宣四朝为第三个时期。此时版本学著作形式进一步丰富，出现了以杨守敬《留真谱》为代表的书影，以江标《宋元本行格表》为代表的行款研究著作，以《书林清话》为代表的系统的版本学专著。瞿杨丁陆四大藏书家皆注重版本研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出现了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为代表的标注《四库简明目录》的版本学著作。而此时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无疑是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书林清话》是中国版本学史上第一部有系统、集中探讨版本学问题的专著，对版本学各方面进行了探讨与总结，为清代版本学的集大成之作。杨守敬访书日本，撰《日本访书志》，对稀见旧本尤其是古钞本的价值进行了探讨，编纂了版本学史上第一部书影《留真谱》。其他如缪荃孙、傅以礼、叶昌炽、李希圣、曹元忠、江标等也取得了较大成就。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extual criticism and publication provided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the edition studies. There were many scholars committed to the edition studies, and many of them came from Jiang Su and Zhe Jiang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ir academic interest, we can divide them into two categories: textual criticism and appreciation. They recorded their research results by bibliography, postscript, etc. The reliability of text was their first standard to evaluate various e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y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heritage value. They thus praised editions printed in Song and Yuan Dynasty highly. As time went on, the heritage value occupied a larger proportion in their evaluation criteria. They had mastered comprehensive approaches to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editions, and collatio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basic way. We can divide the edition studies into three periods. The first one began from Shunzhi to early Qianlong. In this period there were many famous edition scholars, such as Qian Qianyi, Maoyi and Qianzeng in Changshu, and some other edition scholars around Xu Qianxue. Fengshu, Fengban, Lu Yidian and Hezhuo concerned about the collation, but Qianzeng and Sun Congtian focusing on appreciation. A large number of edition directories had appeared and The Bibliography of Precious Books of Jiguge was the most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The most influential works were Record of Seeking and Reading Books and Recording Points to Collection of Books. The second period was from Mid - Qianlong to Daoguang. In this period, the edition studies developed tremendously. There were many famous edition scholars and various forms of works. The Bibliography of Tianlulinlang focused on appreciation, and had used comprehensive approaches. This book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edition studies. The Bibliography of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Books also fo-

cused on edition research. Huang Pilie and Gu Guangqi were two well – known scholars in this period. Huang Pilie was fond of books printed in Song Dynasty and books Collated well. He was good at identifying editions . So he was a top scholar in the history of edition studies. Gu Guangqi paid attention to books printed in Song and Yuan. And this concept caused a direct result the thoughts of collating without collation. Postscript of Books of Baijinglou and The Bibliography of Books of Airijinglu were models for compiling bibliography. Other scholars such as Ruanyuan, Sun Xingyan, Qian Daxin, Bao Tingbo and Chenshan, etc.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too. The third period was from Xianfeng to Xuantong. In this period, various new forms of works had been created. Four well – known bibliophiles such as Qu Yong, Yang Shaohe, Dingbing and Lu Xinyuan attached importance to edition studies. Shao Yichen and Mo Youzhi annotated to the Concise Directory of The Bibliography of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Books, and made a great achievement. Ye Dehui, the writer of Shulinqinghua , made the greast achievement. Yang Shoujing searched books in Japan and wrote Notes of Searching Books in Japan in which he revealed the value of codex. Miao Quansun, Fu Yili, Ye Changchi, Li Xisheng, Jiangbiao and other scholars also focused on the edition studies.

序

版本一词起于北宋，指雕版印刷的书本。但发展到今天，这个术语的含义已经产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一切书本形式都可以用“版本”这个词来表达，刻本以外如活字本、石印本、排印本、影印本，以及印本之外的写本，数字化的电子本，都被视为版本形态。对这些版本形态的认定工作也就列入了版本学的范围。版本的认定则包括断代、版本类型的认定、版本源流的考察、版本优劣的评判等方面。由此而上溯中国书本的历史，则版本学的起源就早得多了，只要有书本，并且有对书本的认定工作，这种认定工作有一定的学术含量，那么这种对书本的认定工作就带有版本学的意义。远的不说，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乙本，甲本“大邦”、“小邦”，乙本作“大国”、“小国”，专家据此认为甲本写于西汉以前，而乙本写于入汉以后。原因是乙本避汉高祖刘邦的讳。以今天版本学的任务来看，这应该属于版本学的工作范围。既然是版本学的工作范围，那么研究的对象《老子》甲本、乙本就是版本。这样“版本”就不再限于北宋人口中“版本”的含义了。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似乎应当作这样的认识，一切书本形式都是版本形式。不同文本之间的文字差异，至少在孔子整理六经时已经存在，而在刘向校理皇家藏书时已大量论列，中书、外书、臣向书、臣参书、步兵校尉立书，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不同版本。它们之间的差异，如刘向《晏子书录》所云：“中书以‘天’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就是版本之间的不同。刘向校定的本子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整理本”。版本之间错字的多少，内容的完缺，这样的差别，自然也就有了“善”与“不善”的差别。这些都与今天版本学研

究的内容十分接近。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版本学产生甚早，应当可以上溯到先秦。当然这门学问的完善应当是宋元以来甚至是清代才基本完成的。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我们不妨兼而听之，继续加以讨论，到了一定时期，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大体一致的看法。

江曦的博士论文《清代版本学史》，暂时回避了“版本学”成立于何时这个目前尚难达成一致结论的话题。我想这样做比较妥当，即探讨大家意见比较一致的清代。这一阶段成果比较丰富，探讨起来用力的余地也大得多，并且对我们今天研究版本学启发也较大。这样的“版本学史”还是第一部，带有尝试的意思。中国的学问，往往是实践多于理论，学者用自己怀抱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学术实践，却很少把这种理论系统地写出来。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都是这样。版本学的实践活动表现为有选择地收藏书籍，为书籍撰写题跋，编写书目、书志，校订讹字脱文，抄写副本，刊印新本，等等。宋代廖莹中撰写、元代荆溪岳氏增补的《九经三传沿革例》、清代孙从添的《藏书纪要》，直到清末叶德辉的《书林清话》，都在从不同角度传达着版本学理论的总结与思考。而系统性较强的版本目录《天禄琳琅书目》，更体现出编者较为完整的版本学理论修养。细细梳理清代版本学实践和少量版本学理论成果，从而总结清代版本学达到的高度、发展的足迹，并且体察清代版本学发展与清代目录学、校勘学、训诂学以及经史考据等学科发展的互动关系，探索清代版本学对前代的继承和对近代以来版本学的影响，都是清代版本学史的任务。这项工作实际上是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部分，也是中国版本学史的一个阶段，其关乎全局的意义不可忽视，其开拓意义也就显而易见了。江曦这本《清代版本学史》是从爬梳原始材料中得来的，同时也参考了已有成果，其中容有不够完善之处，相信他今后会不断努力，写出更理想的修订本。

我和江曦认识是2004年，那年他在山大中文系念本科四年级，取得推荐免试上研究生的资格，旁听了我一节“文献学”课，下课休息时间问我可不可以跟我作研究生。我表示欢迎。很快他就加入我的《清人著述总目》项目组。那时项目初创，急需人手抄

制条目卡片。我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和“抄制卡片细则”交给他，并告诉他这部书目有不少附注条目应分析独立成条。他上手很快，也十分到位，效率高，没废话，从这本书目抄录清人著述条目卡片九千余条，许多条目包含若干异本。他练过书法，书写准确并且快速，所以在后来的工作中，从总体上估算，他一个人的工作成绩相当于两个人。有一次他抄写项士元的《台州经籍志》，发现前面有民国四年（1915）章太炎先生的序，就来问我。我说这篇序不常见，可能是集外文。如何证明这一点？我告诉他首先查《章太炎全集》，再看看汤志钧等先生的《章太炎年谱长编》。结果他发现都没有涉及这篇序。我提示他，山大图书馆有一部项士元的《中国书目考》未曾刊行，好像有太炎先生的序。他又找来看，果然有一篇序。由于该书未曾刊行，知者甚少，太炎先生的序自然也罕见。所以他以同样方式证明这也是一篇佚文。其后，他又在《台州经籍志》中发现了章太炎为项士元弟弟项元哲写的墓志铭，同样是太炎先生的佚文。我让他把发现和考证的过程以及三文的价值写出来，送给刘晓东先生看。刘先生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文史初探》，对章太炎先生很有研究，他说：“这三篇文章确是太炎先生写的，亦是不为人知的佚文。”建议发表。文章投《文献》，获得采用。这对一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来说，真是莫大的鼓舞。其实我在刚工作不久，随王绍曾师编纂《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在查阅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时，也发现前面影印有一封蔡元培致顾燮光的信，查中华书局《蔡元培全集》未收，于是考其写信年份、背景，作了一篇跋，发表于《文史》杂志。两件事情大概前后相隔十五年，却是惊人地相似。我对江曦的学术潜质有了初步的认可。刘晓东师也对他时时鼓励。《清人著述总目》抄制条目卡片130万条，合并剔重，分类排纂，其间需要考证的细节不计其数，居然用了八年才初步完工，与其役者三百余人。江曦随我从事《总目》编纂工作一转眼八年过去了。2011年他博士毕业，由于历年发表的论文较多，荣获教育部高校古委会二等奖学金、教育部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山东大学校长奖学金，担任《清人著述总目》副主编，条件优越，成功获准留校工作，我的项目组（学术界戏称“杜家